



□ 本报记者 卢昱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境内外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十几年来对丝绸之路进行“精准复原”，被称为“探险家”式的学者。近日，他的《葱岭之外》一书发行，向读者展现在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葱岭（帕米尔高原）周边的历史变迁。

葱岭，见证了印欧人的战车隆隆驶过，目击了亚历山大的方阵整齐行进，送别了玄奘在风雪中前行的身影，倾听过成吉思汗呼啸而来的铁蹄，也回响过俄国的火炮轰鸣。每一个时代的技术革命都在这里留下印记，每一次文明的碰撞都在这里激起火花。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同文明的人们依然相遇在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书写着新的故事。

葱岭为什么叫葱岭

《葱岭之外》是人文随笔，分了十二章，眉目清楚，照片多为作者所摄。这种基于实地考察而成的历史地理类写作，比起沉迷书斋的皓首穷经更令人钦佩。

这样的实证精神，早在侯杨方心里扎根。10年前，笔者曾在台儿庄采访侯杨方。那时，他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尤其是遇到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等人写的科学哲学书，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卡尔·波普尔“不可以证伪的都是伪科学”，深深刺进了他的脑海，以致现在，侯杨方也经常说不可证伪的东西都是语言游戏，没有意义。

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学者往往囿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政治史学者关注王朝更替，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军事史学者专注于战争技术，却忽视了地理环境对战术选择的制约……

更严重的是学术视野的狭隘：研究中国的学者对外国缺乏了解，研究外国的学者同样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研究唐朝和明朝的学者也互相对方的领域感到陌生。这样容易产生一个现象：总以为自己的领域具有独特性，更无法深入理解人类历史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这种分工虽然精细，却人为地割裂了历史的有机整体。

侯杨方的学术历程恰恰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从早期的《中国人口史》，到后来的《盛世》《治世》《名臣》《征战》等历史著作，再到多卷本《清朝地图集》的编纂，《重返帕米尔》《这才是丝绸之路》等结合实地考察的著作……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运用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并且不断转换研究兴趣和方法。

对于国内丝绸之路研究最薄弱的区域——葱岭之外，侯杨方的研究方法是边走边看，他沿着玄奘、马可·波罗、斯坦因等历代探险家的足迹，探索丝绸之路上的葱岭和葱岭之外的广大区域，徒步、骑马、自驾，实地考察，精准复原了历代丝绸之路的路线。

侯杨方说自己对“葱岭”的认知变化，就是实证精神的典型案例。葱岭为什么叫葱岭？2100年以来，学者大都做文献内循环，不求真，不追溯到最根本的起源，不寻找物理证据。2013年春天，在慕士塔格峰脚下海拔



相遇在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4200米的广袤荒原上，侯杨方发现了一望无际盛开野花的野葱——大花葱。这种野葱的分布区域从土耳其一直延伸到新疆，而帕米尔恰好处于其核心生长地带。当晚，侯杨方团队用采集的野葱炒了一盘肉片，味道浓烈又独特，口感甚好。

“学历史的人经常把文本当作证据，这是不够的。我在玄奘之路现场拍的照片，我敢说就算拿去给玄奘看，他也马上能够认出来。那就是他走过的地方，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我认为这种证据才是可靠的。”侯杨方说。

侯杨方有着“而知也无涯”的清醒。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都无法完整把握葱岭内外土地的复杂历史面貌，他所倡导打破学科壁垒的综合性研究，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奏效明显。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是地理、气候、技术、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绝非单一学科所能完整解释的。

《葱岭之外》将文献考辨、实地考察、考古发现与现代科技手段这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从而构建了一个多维、可靠的证据体系。书中对西迁匈奴的分析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东汉窦宪击溃北匈奴后，匈奴人西迁至中亚，与当地塞种民族相遇并融合后继续向西进入东欧草原，最终于公元4世纪以“匈人”的身份横扫欧洲。这一原本基于罗马史料模糊记载的假说，近年来通过对天山地区匈奴人古尸的DNA分析得到了关键性的科学证实，并与《封燕然山铭》的石刻记载形成了有力的交叉互证。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洗牌

在侯杨方看来，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文明的交会点，是文明的通道。从青铜时代印欧人随战车与马匹驰骋欧亚的迁徙浪潮，到希腊、匈奴与大汉在中亚的相遇与角力；从大唐、阿拉伯、吐蕃三方在西域的巅峰对决，到契丹西迁、蒙古铁骑横扫大陆的史诗，再到清朝与准噶尔汗国持续七十年的生死缠斗……侯杨方将中亚文明这一幕幕的历史演变以舞台剧般的叙事形式呈现出来，带领读者回到那个文明不断碰撞与重生的“十字路口”。

地理的严酷与馈赠在葱岭交织：高山阻隔却留通道，荒漠困围却育绿洲。正是这矛盾的地理格局，塑造了中亚作为文明熔炉的独特命运。在书中，侯杨方通过实地走访，钩沉历史，揭开了中亚作为四大文明圈交汇点的独特面纱。

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文明带来的不仅是骑射技术，更是一整套适应草原环境的生存智慧。毡帐的设计看似简单实际凝聚了千年的经验——既要保暖防风，又要便于拆卸搬运；既要结实耐用，又要轻便灵活。马具的每一个细节，从马鞍到马镫，从缰绳到马掌，都是技术不断改进的结果。弓箭的制作更是一门精湛的艺术，复合弓的威力甚至超过了早期的火枪。

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文明带来了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达中亚时，他们不仅带来了方阵战术，更带来了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等科学知识。科林斯柱式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的宫殿中，不仅是建筑风格的传播，更是数学和力学原理的应用。希腊式的城市规划，以广场为中心，街道呈网格状分布，体现了理性规划的思想。

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文明贡献了精湛的冶金技术和深邃的哲学思想。著名的大马士革钢，其实是印度乌兹钢在中亚的再加工产品。

印度工匠掌握了独特的冶炼方法，能够生产出碳含量极高、韧性极好的钢材。这种钢材经过中亚工匠的锻造，制成的刀剑削铁如泥，成为传说中的神兵利器。而佛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宗教信仰，更带来了逻辑学、因明学等思维工具。

来自波斯的文明则贡献了卓越的水利技术和行政智慧。坎儿井系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地下挖掘暗渠，将山区的地下水引到平原，既减少了蒸发损失，又避免了污染。这项技术使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发展农业成为可能，从波斯传播到整个中亚，甚至远达中国新疆。波斯的行省制度、税收体系、驿站网络，都被后来的帝国所借鉴和改进。

在AI时代，上述技术进步与交流的逻辑，更值得今人深思。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印欧人征服了石器时代的土著；掌握了骑射技术的游牧民族称霸草原数千年；掌握了火药技术的定居文明最终战胜了游牧帝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洗牌，创造新的强者，淘汰旧的霸主。

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底色

在《葱岭之外》的叙事中，地理并非沉默的背景板，而是历史的主角之一。侯杨方提出“技术地理学”视角，剖析中亚的地理格局决定了技术传播的主要路径。

草原之路是传播速度最快的途径。游牧民族的高度流动性使得技术创新能够迅速扩散。一个部落发明了新的马具，几年内整个草原都会采用；一种新的战术在东方被证明有效，很快就会传到西方。这种快速传播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和游牧民族的交流网络。每年的夏季聚会不仅是贸易集市，更是技术交流的大会。

绿洲之路则是深度传播的渠道。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技术的改进和精细化。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城市，从库车到和田，从吐鲁番到敦煌，形成了一条技术改进的链条。造纸术在这里从粗糙变得精细，印刷术在这里从雕版发展到活字，纺织技术在这里融合了东西方的特色。每个绿洲都像是一个技术实验室，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

山地通道虽难行，但往往是技术突破的关键。帕米尔高原的几个主要山口——排依克山口、伊尔克什坦山口、别迭里山口等，都见证了重要的技术交流，它们是中国通向中亚距离最近的通道。军事技术往往通过这些山口传播，因为它们经常是军队远征翻越之地。

河谷地带则是技术融合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泽拉夫善河谷、阿姆河流域，不同文明的技术在这里相遇、碰撞、融合，产生新的技术形态。费尔干纳的良马结合了当地的育种技术和中原的相马经验；撒马尔罕的造纸作坊融合了中国的技术和阿拉伯的改进；布哈拉的织造工艺吸收了波斯的图案和突厥的技巧。

历史并非由技术单向书写，地理环境同时对技术的应用和效率发挥着重要的筛选与调制作用。中亚不仅是技术传播路网的核心枢纽，也必然成为每一次技术冲击波的首要目标与交锋战场。

由此，侯杨方顺势推出一个道理：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底色，它设定了文明发展的边界条件。中亚的地理特征——平坦开阔，干旱少雨，连接四方——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也决定了它难以形成统一持久的本土帝国。这不是宿命论，而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任何一个在此兴起的文明，都必须面对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与合作；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也都会在此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与转化。而作者在书中层层递进的分析，并非地理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分析工具，这为我们理解文明兴衰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上出现的马匹。

书单

（开太平：宋太祖赵匡胤）

毛元佑 雷家宏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一部生动再现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如何从一名底层士兵登上权力之巅，开创并经营初创王朝的通俗传记作品。上篇从赵匡胤的微小时代展开，讲述其作为普通少年离家谋生的艰辛与屈辱，以及作为怀揣壮志的“非典型青年”不甘平庸投身军旅，从底层士兵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过程。中篇着重讲述登上政治舞台的赵匡胤，如何凭借超凡的军事天赋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为北宋王朝奠基石。下篇主要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视角，讲述“帝王赵匡胤”以制度设计重塑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智慧和长远韬略。这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深刻反映唐宋至宋初这一动荡时代下，社会风貌与历史变迁的时代传记，从中不仅可以领略到赵匡胤底层逆袭的智慧和勇气，也可以看到北宋初年平民百姓的生活与挣扎，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复杂。



《食野中国：中国传奇食材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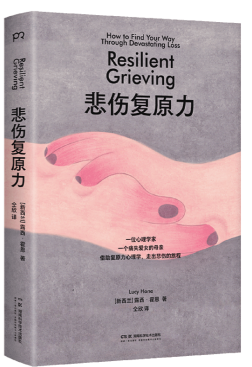
神婆爱吃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这是一场历时3年、行程近100万公里的田野寻味。拥有15年全球美食探索经验的作者，深入中国顶级食材“原产地秘境”，对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在地农人，记录即将消逝的农耕智慧与古法技艺，为中国物产发声。在商业化与全球化浪潮中，作者犀利探讨了如何守护中国食材的独特灵魂……该书不止于吃，更揭示了一场关于自然、经济、人文、时间的深度博弈。



《悲伤复原力》

【新西兰】露西·霍恩 著
全欣 译
浦睿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位心理学家、一个痛失爱女的母亲，借助有效的复原力策略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兴趣。2014年，12岁的女儿艾比因车祸丧生，这让她陷入巨大的悲痛。在该书中，作者坦诚分享了痛失至爱的无助与脆弱，并从自身经验中提炼方法，通过制定、遵循本书分享的“悲伤复原力”策略，重新拥抱生活，发现生命的真谛，帮助许多读者重新理解正在经历的悲伤，重建对于自身复原力的信心。（□记者 蔡可心 整理）



我与书的故事

一本好书便是一束春光

□ 李从尼

总有一些书籍，不期而遇，却能穿透岁月的浮躁，在心底留下温柔印记。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于我而言便是如此。

与书的相逢，始于一场图书漂流。彼时我深陷中年困顿：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在肩，工作的琐碎磨平了棱角，生活的平淡耗尽了热忱，满心都是疲惫与迷茫。那日下午，我心烦意乱地驻足楼下的木质漂流架，一本旧书闯入眼帘——浅绿与米白交织的斑驳纹理，像被河水冲刷过的浅滩，一条浓黑的不规则的墨块贯穿封面上部，形态如额尔古纳河的蜿蜒河道，三只驯鹿奔跑跳跃，形态自由且灵性。卷边的书页里藏着暖意，扉页娟秀的留言写道：“愿此书中的微光，能照亮你前行的路。”我轻轻取下它，也开启了与这本书、与自己和解的旅程。

循着文字，我走进大兴安岭，与鄂温克人一同牵着驯鹿踏雪原，在严寒中守望，在苦难中相守望。最动人的，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敬畏：敬畏山神，与山林共生；敬仰火神，守护部落烟火；叩拜日月星辰，感悟生命真谛；敬重动物灵魂，与驯鹿温柔相伴。这份纯粹如额尔古纳河的流水直抵人心，让我在浮躁中寻得安宁。

“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初读只觉温柔，细品方知其中深意。彼时我被苦难与迷茫裹挟，总在遗憾过往，焦虑未来。可鄂温克人即便历经驯鹿走失，亲人离世，身居冰天雪地，也始终心怀希望，坚信春光会消融积雪，治愈所有伤痛。这让我忽然明白，春光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暖意，而是心底的坚守与勇气，治愈的是心灵的困顿与荒芜。而“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的，你以为用手抓住了，可仔细一看，手里是空的”，则轻轻点醒了迷茫的我。曾经的我，总在盲目追逐——追逐遥不可及的完美，追逐虚无缥缈的虚名，追逐早已逝去的过往，以为抓住了这些便能收获幸福，到头来却只剩满身疲惫与无尽遗憾，弄丢了当下的安稳。读懂这句话，读懂鄂温克人的生活哲学，我才恍然大悟：人生本不完美，不必强求过往，执着虚无，学会放下执念、珍惜当下，便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文字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在某个时刻悄悄改变你的存在。从此，每当我疲惫困顿的时候，便约几个伙伴一起爬山、环湖，去看看山峦叠嶂，听听水流潺潺，走出去，慢慢会发现，原本困扰我的焦虑不知不觉随风飘散。这本漂流而来的书，我悉心珍藏——舍不得这份跨越陌生的缘分，更舍不得这束照亮我中年迷茫的微光。原来，一本好书便是一束春光，一句箴言便是一剂良药。

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请用千字左右，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相知、相知的故事。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dazhongribawt@163.com



日常用语背后的文化密码

为什么是“马上”？

的语病——应诺办事时，可曾真的跨出门去寻一匹马？茅塞顿开时，又几时真正骑上了马背？著名美术史学者李霖灿在《中国艺术沉思录》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日常用语背后的文化密码。原来，在创造“马上”这个词的年代，马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说“马上去办”，本是骑着最快的坐骑去办理。随着词义引申为“最快”之后，才有了“马上明白”这样抽象的表达。

有趣的是，词义的演变往往追不上时代的脚步。据说有一位老太太怕儿子骑摩托车肇事，日日向关帝庙上供奉，结果儿子还是因超速而受了伤，于是这位老太太便大大抱怨关公，说他未尽到责任。晚上做梦她得到了关羽的答辞：“我是心血来潮时，知道了您的儿子将要出事，但是我不敢懈怠，立刻拿起青龙偃月刀，跨上胭脂赤兔马赶去救他，这才发现我的战马速度没有摩托车快；所以我实在是有心无力，为您儿子的摩托车是‘野狼’！”若此梦当真，今人表快捷，怕该说“狼上”或“车上”，而非“马上”了。

此番引申，让人想起动物与人的亲密关系。除狗之外，便是与马最为亲近，故有“愿效犬马之劳”的说法。但在艺术史上，马的分量远重于狗。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起，历秦始皇的万兵兵马俑，汉代的马踏匈奴像，甘肃武威的马踏飞燕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浮雕，金朝名将兀术的拐子马，元代大汗忽必烈的铁骑扫荡战，一部历代战争史简直就由马的身边生活生生地串联起来了。

在艺术表现上，马更是蕴含独特的美学价值。山东临沂沂南出土的马戏立鞍拓片传达出另外一种美，不但把速度感表达得充分，而且音乐节奏感也表现得十分铿锵，鞍上表演人的身軀略向前倾，使向前驰骋的力感得到了微妙的平衡。同样，结尾鞭梢的回旋，使整个画面的气势不外溢，更是艺术家的慧心安排，使人越读越觉得意味深长。

这让人想起汉字“骗”，从“马”而不从“言”。原来在古代，“骗马”本是一种马术游戏，从这边跳上去，由那边落下去，就叫作“骗马”。以前跳高，由侧方跨过去就叫作“骗竿”，原

来饶有古意，只是如今跳高都用正面滚竿姿势，于是这个“骗”字就不明原委了。

“马上”一词，或许正诞生于这样的时代。秦汉时期，人负马疾驰，请人办事便立刻上马出发，久而久之，“马上”就成了“立刻”的代称。这个词义的演变，正应了李霖灿先生所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举一例可征大局”。比如日常饮酒时呼喝的“八匹马啦”，这不不过是一句极平常的酒令，但若深究起来，周穆王、西王母、王良、造父、韩幹、李龙眠以及赵孟頫，甚至郎世宁的《八骏图》都有涉。

禅意与画理相通。文通和尚说“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道出了中国艺术重神韵的精髓；九方皋相马“直取神骏而忘其糟粕”，更成为文人画的真谛。塞翁失马的故事，道尽人生祸福倚伏的哲理；“人家骑马我骑驴”的俗语，说出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心态。请李商隐《瑶池》中“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之句，再回想开篇那个“马上明白”的问题，答案似乎已在其中了。



●沂南出土的马戏立鞍拓片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生活中常有一些不经推敲的习惯用语。朋友托付一事，我们应承：“好，马上去办。”听人解说一番，我们恍然回应：“你这么一讲，我马上就明白了！”细究起来，这话里却藏着有趣